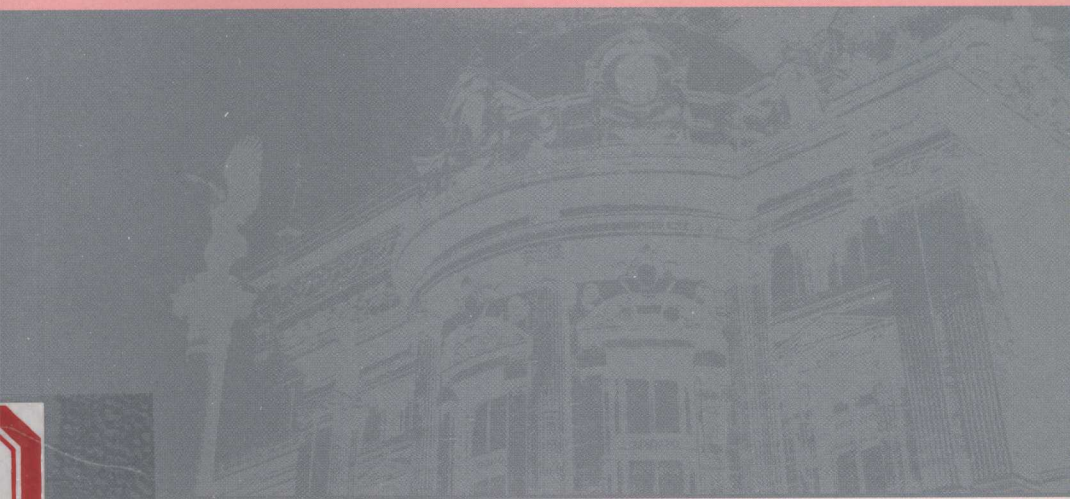


张芝联 著

法国史论集



生活·讀書·新知 三联书店

法国史论集

张芝联 著

生活·讀書·新知 三联书店

Copyright © 2007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
All Rights Reserved.

本作品版权由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所有。
未经许可，不得翻印。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法国史论集 / 张芝联著. —北京: 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,
2007. 11

ISBN 978 - 7 - 108 - 02798 - 6

I. 法… II. 张… III. 法国 - 历史 - 文集 IV. K565.07 - 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7) 第 125400 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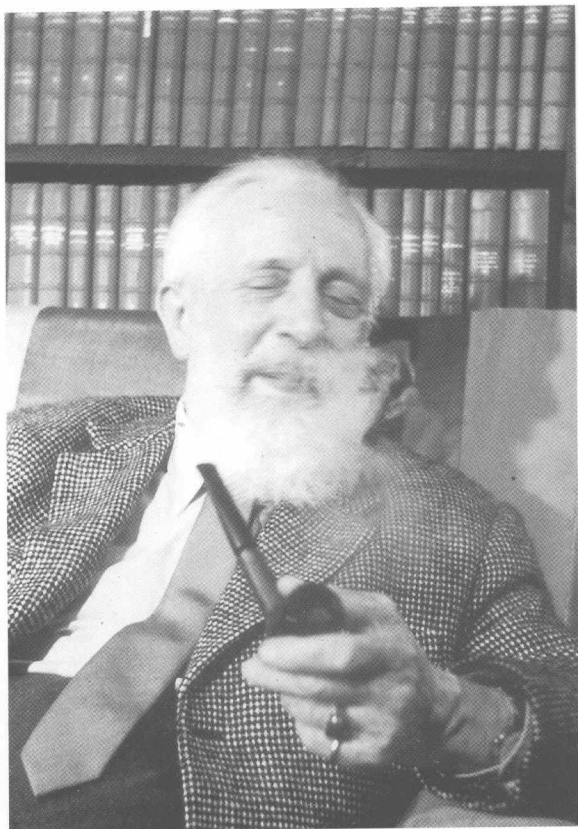
责任编辑	刘雪枫
封面设计	罗 洪
出版发行	生活·读书·新知 三联书店 (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)
邮 编	100010
经 销	新华书店
印 刷	北京京海印刷厂
版 次	2007 年 11 月北京第 1 版 2007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开 本	880 毫米 × 1230 毫米 1/32 印张 11.375
字 数	243 千字
印 数	0,001 - 5,000 册
定 价	28.00 元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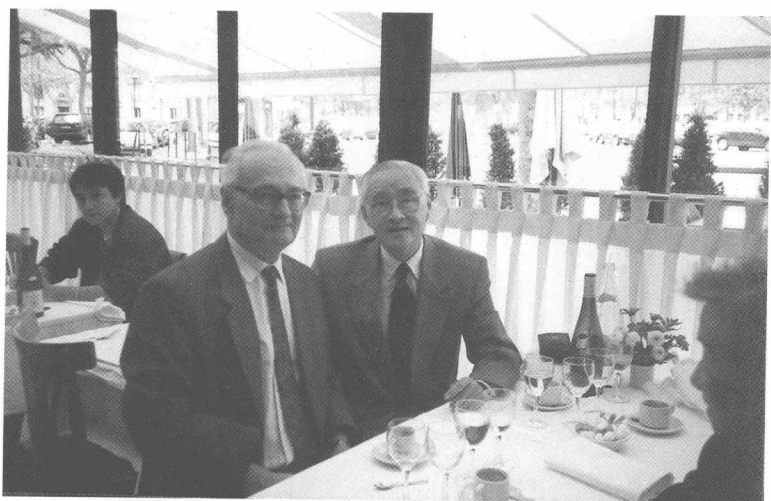
法国著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阿尔贝·索布尔



1987年11月2日，作者在巴黎索布尔墓前



北京中法汉学研究中心主任、法国著名汉学家安德烈·铎尔孟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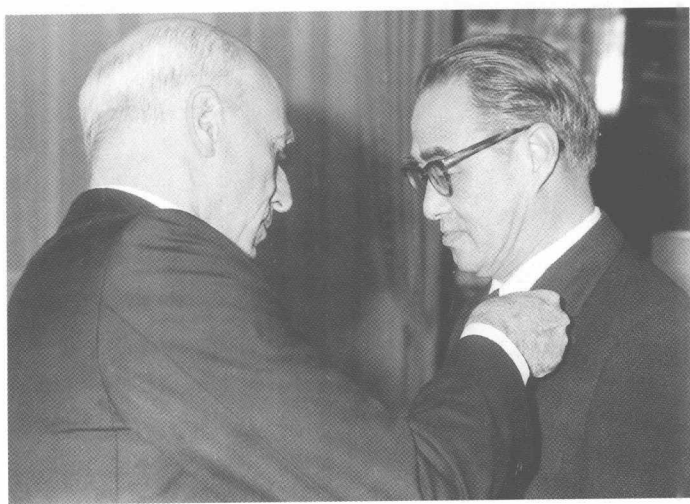
法国远东学院院长、汉学家王德迈教授在巴黎招待来访的作者



法国汉学家让·谢诺应社会科学院邀请，于他初次访华四十年（1948—1988）后再度访华讲学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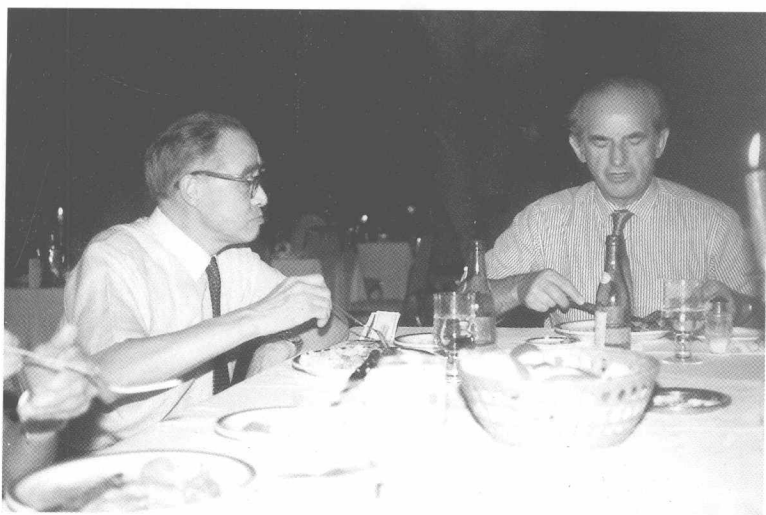
1985年4月17日，法国汉学家、法兰西学院教授谢和耐访问北大。左起：张芝联、谢和耐、邓广铭、周一良、王永兴



1985年3月15日，法国驻华大使夏尔·马罗向作者颁发荣誉军团骑士勋章



作者与法国驻华大使毛磊在一起交谈



1986年8月15日，法国学者、政治家阿兰·佩雷菲特访华时与作者在一起



全国政协《迎接21世纪》论坛，王光美、张芝联、阿兰·佩雷菲特和法国驻华大使白乐尚在一起交谈



1998年10月5日，阿兰·佩雷菲特在家中接待作者，这是二人之间的最后一次谈话



阿兰·佩雷菲特去世以后，在中国举行的纪念会

前言

——我与法兰西

朋友们,特别是外国朋友们常问我:“你怎么会对法国历史发生兴趣?”我的回答往往含糊其词,或者词不达意,不能令人满意,连我自己也不满意。原因何在?大概是因为自己没有想清楚;或许这是一个说不清楚的问题,至少不是三言两语所能说得清楚的。让我再做一次尝试,看看效果是否比以前好些。

我在中学读书时,认识了一个在大学学外国文学的高才生,我经常到他的宿舍去玩,听他讲莫泊桑的小说《一生》和《腻友》,很羡慕他能读法文原本。到了大学,我除学英国文学外,还选修了法语,学了两年勉强能看懂简单的法文书,但读音被那位美国老师教糟了,p和b、t和d清浊不分。后来在上海跟一位地道的巴黎夫人学习,每周两次,一次会话,一次读书(选读A.法朗斯的 *Le crime de Sylvestre Bonnard*),这样才算把美国法语纠正过来。1940年大学毕业后,我同几个朋友创办了《西洋文学》月刊,专门翻译西方文学名著,当然包括法国文学。我曾负责校阅李健吾先生译的福楼拜的《情感教育》和卞之琳先生译的贡斯当的《阿道尔夫》,从他们那儿学到不少东西。我自己还写过两篇有关法国的

书评,一篇是《法兰西的悲剧》,分析法国战败的原因,一篇是评介《夏多勃里昂传》,两书的原作者都是法国著名传记家、评论家A.莫洛瓦。这两部书引起了我对法国历史和现状的初步兴趣。

1942年春,我因日军占领燕京大学而辍学,不得已进入中法汉学研究所当助理,这就为我研究法国汉学和汉学家创造了条件。我开始与法国学者交往,特别与一位学有专长、思想敏锐、热爱中国文化的艺术家庭出身的余敦华(Geoffroy-Dechaume)结为好友。我们日夕交谈,相互琢磨,使我对法国和西方文化历史有了进一步的了解,也对中西文化的异同有所认识。我们的交往史记载在余敦华所著《中国面向世界》(1967年出版)一书(三联书店1987年出版中文本,袁树仁译),书中收集了我们的来往信件。为了涂上一层保护色,他称我为“唐林”。

1947年夏,我从英国到法国,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办的“国际了解研讨会”,为期七周。七八月份的巴黎对初访法京的人有无限的吸引力。战争结束才两年,法国在物资缺乏、政治动荡中寻找出路。法共在议会中成为第一大党,戴高乐的法国人民联盟异军突起;第三共和国时期的政客粉墨登场,重弹旧调,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。然而巴黎的文化生活依旧丰富多彩,各派思想争领风骚,马克思主义、存在主义、自由主义、天主教新托马斯主义、法兰西行动等思潮都占领一部分市场,使人眼花缭乱。我在余敦华指引下逐步熟悉了法国的现状,玩赏了艺术之都的风光,为今后更深入的了解奠定了基础。

九年后,即1956年8月,我又有机会访法,这是解放后经过七年的思想改造运动,我第一次出国参加国际学术会议——第九届国际青年汉学家会议。我们一行四人(翦伯赞、夏鼐、周一良和

我),我管理生活财务,兼任翻译。这次出国的时机很好: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提前完成,知识分子政策逐步落实,双百方针郑重宣布,当时法国也有意与我国恢复外交关系。

旧地重游,发现法国已从战后创伤恢复过来,欧洲共同市场的设想初步实现,法国开始享受“三十年和平发展”的繁荣果实。这次访问取得了三个积极的成果:一是结识了一大批中青年汉学家,二十年后这些人都成为汉学研究的权威专家;二是与挚友余敦华久别重逢,我们又继续对话,交流思想;三是接触了若干法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,如研究巴黎公社史的布吕阿(J. Bruhal)、研究中国近代史的谢诺(J. Chesneaux)等,他们顶住了匈牙利事件和赫鲁晓夫“秘密报告”后的“退党逆流”,坚持马克思主义历史研究。这些接触为我今后研究和引进法国史学流派准备了条件。

没有想到,从1956年第二次访法与1979年第三次访法之间,相隔竟达23年之久!这个时期发生了一些什么情况使我国与国外学术交流完全中断,众所周知,毋庸赘述。不过,有几件事情仍值得一提。1950年6月戴高乐将军东山再起,被任命为法国总理,我国经过一段时间观察后做出了积极的反应。1961年,中国学术界举行巴黎公社90周年纪念大会,我被调去为吴晗(北京历史学会会长)草拟讲稿。1964年,中法恢复正式外交关系,第一批法国政府派出的教师与留学生来到北大,其中有巴斯蒂(Bastid)、龙巴尔(Lonbard)、萨尔蒙(Salman)等,他们后来在各自的领域里成为出类拔萃的学术领头人。我在同他们的交往中多少了解到法国史学界的动态。同年,我为沈炼之先生校阅的瑟诺博斯的《法国史》出版了,书前有我的长篇序言,对此书作了“批判

性”的评论,这是出版界提出的要求。

在史无前例的日子里,我理所当然地受到了冲击。出乎我的意料,学生们批判我的两条“罪状”都与法国史有关:一条是说我在讲巴黎公社时认为“没有共产党的领导也可以建立无产阶级专政”,从而否定了党的领导;一条是说我推崇“修正主义者饶勒斯”,把他吹捧为“诚实的社会主义者”。实际上,将1871年的巴黎公社定性为无产阶级专政的是恩格斯;我只是想说明,没有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专政是不巩固的,不完全的专政,是注定要失败的。至于饶勒斯,谁也不能否定他是一个社会主义者,而称饶勒斯为“诚实的社会主义者”的也是恩格斯,因为饶勒斯真心诚意地相信,在法国条件下只能实行他的一套民主的、改良的、和平的社会主义。从某种意义上说,学生的这些“批判”对我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,使我进一步去钻研1871—1914年的法国历史;在以后的教学中和法国史年会上曾多次涉及这些问题。

“文革”中也有一些使我兴奋的突发事件:1973年春,上面交来一项紧急任务,要我翻译一本小册子——《戴高乐将军之死》,法国名记者让·莫里亚克(J.Mauriac)的著作。全书约七万字,要我一个月里交卷。事后才知道,这是为迎接法国总统蓬皮杜访华的准备工作的一部分。我受宠若惊,日以继夜地、高质量地完成了任务,如期交卷。1973年6月1日商务印书馆把此书作为内部读物出版了^[1]。9月13—17日,蓬皮杜总统正式访华。我被邀请参加欢迎总统的国宴,名见报端;这在当时可以说是一种“殊荣”。对我来说,这也是我倾向于戴派的渊源。

[1] 为纪念戴高乐将军诞生一百周年,商务印书馆于1990年9月公开出版此书。

1974年,轰轰烈烈的“批林批孔”运动开始了,从此引发了一场“评法批儒”的斗争。这场斗争本来与我们教外国历史的人无关,但有人异想天开,不满足于搞乱整个中国历史,还要把外国历史也扯进去,胡说什么拿破仑是法家,应加以肯定。于是一批唯上派唯恐落后,紧紧跟上,炮制出一篇又一篇“论文”,一本又一本小册子,来论证拿破仑的法家路线。我当时被征调去注释王充的《论衡》(据说王充也是“法家”),因此没有卷入这场“拿破仑战争”。但是痴人的呓语有时具有出乎意料的作用,它促进了史学界后来对波拿巴的研究,我后来也参加了。

正如拿破仑在1799年宣布“法国革命结束了”一样,华国锋在1976年也宣布“文化大革命结束了”。两个“革命”都进行了十年之久,但一个是真革命,另一个是假革命;前者引出了军事独裁、战争和王朝复辟,后者则导致了改革、开放和经济高涨。历史就是这样多变和曲折。

1978年不仅在政治上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一年,在我国法国史研究的年鉴上也是如此。1978年10月,北京、上海、杭州以及各地法国史工作者在上海聚会,热情高昂,决定倡议成立法国史研究会,立即开始筹备工作。同年11月,《法国史通讯》创刊号出版了。在这一年的北大历史系五四科学讨论会上,我作了题为“拿破仑与法国革命”的报告。同年10月,我发表了第一篇介绍法国年鉴派史学的论文。这样,我便与法国史结下了不解之缘。

改革开放政策给国际学术交流创造了有利条件。1979年5月我应邀到意大利威尼斯大学讲学。法国朋友知道了我去欧洲的计划,希望我顺道访法。于是我接受了巴黎第一大学的邀请,在结束意大利之行后到法国进行科学考察三周。这是继1947、1956年后

我的第三次访法。与第一、二次访问不同,这次是有计划、有准备的学术交流,成果丰硕。我有幸会见了法国历史学界第一流学者拉布卢斯 (Labrousse)、索布尔 (Soboul)、布吕阿、勒高夫 (Le Goff)、贝热隆 (Bergeron)、沙尔蒂埃 (Chartier) 以及其他年轻一代历史学家。他们向我介绍法国史学的新成就与问题,以及正在深入探索的课题。这样的接触持续了多年,使我在学术交流之外结识了许多朋友,而其间的桥梁是 60 年代在北大留学的玛丽安·巴斯蒂。她在 1978 年重访北大,参加了我们的学术活动,最早向我们讲述了法国历史学派的成果,并为我精心安排了这次法国之行。

这次访法的另一个大收获是与法国革命史权威教授阿·索布尔结识。我一到巴黎 (5 月 16 日) 他就来旅馆相晤,并安排我在他的讨论班上讲课。我以“对拿破仑历史作用的不同解释与方法论问题”为题,阐述了我的观点。班上的老师同学纷纷提问,课后同我共进晚餐,叙谈非常融洽。他们已有多时未同中国学者切磋琢磨了,见了特别亲切。索布尔兴致极高,酒后高唱革命歌曲,朗诵诗句。在我留居巴黎的短短的两周中我们经常见面,讨论各种问题。索布尔是少数没有退出法共的学者,虽然他对党中央的领导不甚满意。他的诚挚、坦率、热情使我颇受感动,特别是他的战斗风格,愿为捍卫真理而抗争的无畏精神。索布尔的几位成熟的学生后来也成了我的朋友。

1979 年 8 月,法国史研究会在哈尔滨正式成立,我被选为会长,几位副会长都是长期从事法国史研究的专家,理事会共十五人,是一个团结、合作的领导核心,它在推动、组织、协调、支持全国法国史研究方面起了积极的作用。这次成立大会正值法国大